



大学的良心

李 均◎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大学的良心

李 均◎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的良心 / 李均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190-2126-9

I. ①大… II. ①李… III. ①高等教育-研究 IV.

①G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40258 号

大学的良心

作 者: 李 均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朱彦玲

责任编辑: 刘 旭

封面设计: 人文在线

复 审 人: 王 军

责任校对: 傅泉泽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43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liux@clapnet.cn

印 刷: 北京市媛明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媛明印刷厂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302 千字

印张: 19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2126-9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书生论道	1
大学的良心	1
从“称谓”看“品位”	5
“40 位教授争一个处长” 是谁的悲哀?	7
为教授职称评审中的“教学标准” 叫好!	8
“校史” 还是“笑史”?	10
再谈“校史” 与“笑史”	12
真理比母校更重要	15
追溯校史不可牵强附会	16
退步的大学	17
1949 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的五大问题	19
《规划纲要》 的特点、亮点与缺憾	22
“211 工程” “985 工程” 的三大误区	27
“一级学科” 改革切勿矫枉过正	29
对近十年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几点质疑	30
大学生就业难呼唤教育回归本质	32
重建批判之维	34
基于教育学术人成长的大学教师发展	38
“车夫” 蔡伟令我等羞愧	40
李醒民教授为什么从来不申请课题?	41

药家鑫一审判死的教育意义	42
考试噩梦	44
一个八岁男孩的愿望	46
我们那个时代的教育很阳刚	47
可怜天下父母心	49
有感于总理“出差”	51
学海泛舟	53
品读大师 高山仰止	53
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	57
读研究生的意义	61
读经典的态度与方法	68
让写作成为你的生活方式	75
不必等到花儿也谢了	81
科研是最好的素质教育	83
科研是最好的继续教育	88
与中小学教师谈选题	94
与研究生谈学位论文选题	102
大学教师的基本功	109
学习、研究、教学实践的三结合	114
角色转换的意义	115
做真正的教师	116
不念讲稿	118
讲出高等教育学的味道	120
教师的职业规划与专业发展	122
批判精神从何来？	131
在迷茫中奋勇前行	132
“野路子”也有春天	133

高教研究的文章太好写吗?	137
是应用研究, 还是御用研究?	139
有才就是任性	141
研究生大规模扩招后的师生关系	145
回忆考研往事	149
难忘的“周末沙龙”	157
鹭岛之行: 一次难得的学术体验	160
大爱无疆	163
忆父亲	163
家史记略(节选)	182
闪闪的红星 不老的童年	199
美味只在追忆中	201
远去的年味 暖暖的记忆	202
又到九月九	205
幸福是什么?	207
享受生命中的每一天	209
追忆蔡克勇教授	210
我读研究生时的第一次课	213
震撼 痛心 困惑	214
人生无常 生命苦短	216
追忆老所长黄宇智先生	217
一个火疥和两粒叮呤引发的噩梦	222
碎石记	227
送别首届弟子	234
离别 20 年, 大学同学相聚桂子山	236
毕业 27 年, 高中同学母校再聚首	237
朱自清《背影》应该从语文课本中删去吗?	238

祖国母亲才“六十五岁”是谁的悲哀？	239
“神七”发射成功，当代杞人有感	240
半个黑瞎子回来了，我们百感交集！	241
别了，2008！	242
远离股市 一生平安	243
一代又一代	245
生活记趣	248
与土豪同行	248
咄咄怪事：观看《南京！南京！》竟遭遇莫名眩晕！	250
新版《红楼梦》雷倒我全家	251
一件有关“二百五”的趣事	253
儿童节游世博	254
面粉不合格，蒸出来的馒头居然是合格的！	256
一个资深球迷的世界杯观战史	257
朝鲜队的0：7比我们光荣	261
别了，五星巴西！	262
24年了，阿根廷队终于又杀回四强！	263
血腥的清晨 丑陋的巴西	264
执掌国足：终结希丁克神奇的唯一办法	265
别了，罗纳尔多！	266
现场看球记	267
台湾教育考察散记	270
青青乐园	274
儿时织美梦 长大攀高峰	274
女儿眼中的中国教育史	277
三狮军团让女儿牵肠挂肚	279
新起点 新生活	280



女儿在淡江大学的初步体验	284
关于何为“好大学”的散思	286
低调做人 用心做事 与人为善 与世无争	288
女儿和她的潘爷爷	290
后记	293

书生论道

大学的良心

有人说，大学是社会的“良心”。那么，大学的“良心”是什么？笔者粗略检索了文献，似乎无人研究。

此问题若从“大学是社会良心”的命题出发，好像不难找到答案。“大学是社会良心”主要针对大学的社会批判功能和社会责任而言，意谓大学要坚守道德底线，坚守批判品格，当社会道德开始堕落之时，大学是最后的防线、最后的堡垒。大学的批判功能和社会责任是由大学的知识分子来承担的。如果说大学是社会的良心，那么大学里那些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便是大学的良心。

笔者认为，上述分析有道理，但非最佳答案。大学固然有批判社会的功能，但大学首先是一个“高等教育”的组织；尽管现代大学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但人才培养还是大学的第一职能。从这个意义看，寻找大学的良心首先要基于大学的教育职能。在我看来，当代大学那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兢兢业业、不图名利、坚守七尺讲台、为教书育人呕心沥血的教师们，才是大学的良心！

此观点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因为在我们的大学里，能被称为“良心”的教师似乎越来越少了。据我的观察，当下中国大学教师可粗略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是“科研型”，即以“科研”为主要追求的教师。无论以创建“高水平”“一流”为梦想的大学，还是一般的教学型大学，甚至高职高专院校，科研早已成为教师们的头等大事，评职称看科研，奖励晋升也要看科研。于是，很多教师都成为“科研型”。这其中确实有一些教师愿意搞科研，也比较适合搞科研，可大量的“科研型”可能是被迫的，或者为利益驱动的“伪科研型”，他们并不真心热爱科研、也不擅长做学问，他们

感兴趣的只是论文课题以及论文课题带来的好处。

第二类是“行政型”，即以“做官”为追求的教师。这类比例有多大，确实不好说。大体包括两类：一类是已经在行政岗位上的教师，俗称“双肩挑”；另一类是虽然没有行政职务，但“心向往之”。笔者几年前曾经在《杂文报》上撰文《“40位教授争一个处长”是谁的悲哀？》，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杂文报》还就此开辟专栏加以讨论。几十个教授争夺一个处长岗位并非个案，而是中国大学的真实写照，是大学行政化现象的必然反映。大学教师中确实有一些人“身在教学楼，心在行政楼”，一边教书一边梦想着“学而优则仕”。我认为，教师兼做行政，无可厚非，何况很多走上行政岗位的教师，是真心诚意为大家做事的，他们“双肩挑”也很辛苦。问题是，如果一个教师，不安心教学科研，把仕途作为人生第一追求，让人尊重的确很难。

第三类是“服务型”，即大学教师中那些整天在社会上到处跑的人。“直接为社会服务”是大学的第三职能，但在有些教师眼中就是第一职能。有些教师平时忙得很，很难见到人，因为他们除了上课，多数时间都在外面跑：有的是“专家”，到处搞鉴定、做报告、偶尔也上电视、上电台；有的当老板当顾问，自己或合伙开公司，赚大钱；有的搞点兼职、兼课，挣点辛苦钱。教师跑社会、跑市场当然也是了解社会、服务社会、拓展专业视野的路径，但倘若把这些变成“主业”，心思都在校外，就有悖“教师”这个称号了。

第四类是“教学型”，即大学教师中以教学为主要工作的人。“教学型”又分为两类。一类只是把教书当成不得不做的任务。这些教师之所以还能安于教学本位，实属无奈。对他们而言，搞科研当然好，但文章写不出来；搞行政搞社会兼职当然好，可惜没机会，于是只好教书，这类也可以叫“教书匠型”。还有一类是真心喜欢教书的，真心为学生着想的，就是孔子说的“诲人不倦”的那种教师，我干脆就把这类教师称为“诲人不倦型”吧！他们即本文所论之“大学的良心”。

上述分类只是相对而言，多数教师是复合型的，只是每个人有所偏重而已。笔者的分类标准不仅看“事”（工作）、看“位”（岗位），更要看“心”（追求）。

笔者把科研型、行政型、服务型教师以及“教书匠型”都暂且排除在

“大学良心”之外，显然有失客观、公平。不同类型的教师都是以不同的方式为大学服务为社会服务，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层面上体现了作为一个大学教师的良心。但我为何要把“海人不倦型”教师称为大学真正的良心？因为良心是基于“义”，而非“利”；是基于内心对人的“爱”，而非基于其他功利性目的。显而易见，与科研型、行政型、服务型教师相比，“海人不倦型”教师从工作中获得的实际利益是最少的。当然，“教书匠型”获利也少，可由于他们对教学可能的不尽心，导致良心无法得到充分体现。

只有“海人不倦型”教师才是真心实意对待教学的。他们全身心投入教学，不为名利、不为职称、不为升迁，就是为了学生好，就是为了让学牛学到东西。说到底，就是为了自己作为一个教师的良心。大学教学基本上是软指标，老师上课怎么样虽然学生心里有杆秤，也有学生打分等评价方式，但对老师而言，这些评价方式的约束力是很有限的。换言之，在大学，教书就是良心活，只有自己才能约束自己。遥想当年，民国时期的不少大师都是有教育良心的。单单看西南联大一个大学的校史就可以找到一大堆例子。朱自清有一次拉肚子，但仍然坚持给学生改作文，坐在马桶上改，一边改一边拉，最后虚脱。陈寅恪上课奉行三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陈先生是在炫耀吗？当然不是。教师要做到每节课都是新东西，单是水平高还不够，更需要对学生高度负责的态度！

有人说，大众化后，学生水平下降了，教师上课也不如以前认真，教学敷衍了事的多了。前几年，某校教学评估时发现有一门课程的成绩表上，填写了一个已经病故学生的成绩，而这个学生并没有参加过这门课程的考试。当评估组去复查试卷时惊奇地发现，该课程的期末试卷根本就没有拆开！如此不负责的老师属于罕见，但混课堂混教学的老师确实存在。有学生抱怨：他们的老师上课就是混，混一节是一节，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也就不想听了。大众化后，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是不争事实，甚至有人认为现在有的研究生水平还不如80年代的中专生。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习惯于把责任归结为生源质量下降，而实际上很多教师不用心教书恐怕才是直接原因，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我们的大学推崇“重科研、轻教学”的办学思想，过于热衷排名，过于热衷各种面子工程，而对学生的

培养重视不够，甚至漠不关心。再往深处看，在短期功利主义的驱动下，我们的大学已经丢掉了教育的本位，已经丧失了教育的信仰，已经不再是高等教育的殿堂。正所谓：今天的大学什么事都做，就是不做教育！

让我们感到庆幸的是，当今的大学还是有一些有良心的老师。前几天，笔者参加我校品牌通识课程的评审，就见识到什么叫大学的良心！经济学院一位姓何的老师，今年45岁了，还是一个讲师，但他对教学一点不含糊，那种认真负责的态度让人感慨、感动。何老师起了一个女性化的名字，却是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男子汉。听他说课，清晰流畅生动，富有激情活力。他为本科生开设的通识课叫《时政经济与经济学应用》，历来都是选课爆满，深受学生欢迎。不过，他的备课很辛苦。既然是“时政”，课程内容就要实时更新，不断重新备课，这样才能跟上多变的中外经济形势。有老师劝他，把课程的名称改一改吧，把“时政”两字拿掉，这样你的课程内容相对稳定，你的备课任务就轻松多了。何老师却不同意这样，他认为拿掉“时政”，课程的特色就没有了。于是就坚持每学期重新备课，教学过程中还不断补充新的专题。他每天的精力几乎都用在教学上了：早上6点半就赶到学校，上网搜集材料，回复学生的邮件，批改学生的作业……他上的每门课深受学生喜爱，粉丝众多。让我感叹的还有他的讲师身份。难道他对教授副教授的职称不感兴趣吗？我想不是。那他这么认真上课，图什么呢？良心！良心！我听完他的说课，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两个字：良心！

我们学校像何老师这样的老师应该还有不少。据教务部主任王晖教授介绍，这次申请品牌通识课的教师，有不少都是真心热爱本科教学的。而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很麻烦的工作，接受反复评审、反复修改本身就麻烦，还要让那些90后学生喜欢就更不容易。搞一门品牌通识课，真不知道要花费多少心血。如果不折腾这个事，至少可以多发几篇文章吧！可敬可叹的是，我们学校每年申请品牌通识课的老师很多，不少都是教授副教授，他们相当认真，课程计划改了又改，精雕细琢，不厌其烦，用心良苦！他们都是大学的良心吧！

前几天，微信朋友圈有两篇文章引起我的注意：一篇是讲大学“速度”的，用一系列令人炫目的科研数据，叙述一个地方大学近年来跨越式发展的辉煌成就；另一篇是讲河南大学向常萍老师终身不写论文不报职

称，学生欢迎，课堂爆满，退休时还是讲师。我发现，那篇谈大学速度的文章，点赞者络绎不绝；而讲述河南大学向教师教学故事的那篇，点赞者却寥寥无几。可见，大家对大学速度的兴趣要远大于大学良心！

我认为，大学的速度固然重要，但大学的良心更重要。大学是什么？张楚廷教授曾经给出了几十个说法。但说一千道一万，大学最根本的涵义还是一个培养人的高等学校。大学信仰的是真理，也是教育。从根本上说是教育、是那种把人培养成为人的真正教育。只重科研，不重教育，大学就变成了研究所，大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当前办学以排行榜为导向、短期功利主义横行的时代，回归大学的教育本位、重建大学的教育信仰尤为关键，而大学的教育信仰又具体体现为像何老师向老师那样一颗颗红彤彤、沉甸甸的良心。

我们呼唤大学的良心。有了良心，我们的大学就有希望，我们的教育就有希望，我们的民族复兴就有希望。（2016年1月）

从“称谓”看“品位”

当年还没来深圳的时候，我就琢磨：这样的开放城市、国际大都市，人与人之间如何打招呼呢？是喊“哈罗，好堵诱堵？”还是“蜜思脱李，好啊诱”？再怎么地，也不会像我们老家那里互相叫“师傅”吧？咱家乡老百姓对工人阶级感情深厚，人与人见面一律称“师傅”，虽不难听，但品位不高。深圳不同了，那可是大城市！

刚到深圳，下了长途汽车，本人便被一片“老板”“老板”的喊叫声淹没！原来的士司机在拉客呢！上了的士，司机问我：“老板，去哪里？”我长这么大，未曾当过老板，赶紧纠正他：“我不是老板，我是打工仔！”司机听我一说，乐了，笑着说：“我看你这样儿，也不像个老板，我是尊敬你呢！”我说：“你们深圳人真幽默”！

可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到一处，都享受被人称“老板”的待遇！在房屋中介，业务员问我：“老板，您要租多大的房子？”在餐馆，服务员问我：“老板，您要点什么菜？”在商场，售货员问我：“老板，您看这件怎

么样？”在马路边，一过路人问我：“老板，请问天虹商场怎么走？”……唯一一次没被称为“老板”，是那天我路过一城中村，一排排发廊里的小妹们纷纷探出妖冶的笑脸大呼：“靓仔，要松骨吗？”“靓仔，要洗脚吗？”

这就是深圳，人人都是“老板”，人人都是“靓仔”！原本对这座城市的好印象，在这一声声俗不可耐的称呼中丧失殆尽。

到新单位工作一段后，我又有新的发现。尽管我们在“教育战线”，但大家互相一般不喊“老师”，而叫官职，如张局、王处、李科、陈所等等。有一天，我到某局办事。临走时，一同事提醒我：见到那个办事的小姑娘，可别喊她“刘老师”或者“小刘”，要叫她“刘科”，否则她一不高兴就不给你办了！我说：难道“刘科”比“刘老师”好听吗？谁要喊我“李科”，我早饭都会吐出来！同事说：你刚来，不懂这里的情况，这里每个小科长、小主任科员都自认为是领导，你不喊，他就觉得你没把他放到眼里。

原来如此！后来我又发现：不仅在机关里要叫官名，在中小学校也一样。如果某个老师当了教学主任或者年级组长，从此就没人再叫他“老师”，而改叫“主任”了。起初，我觉得很好笑，中学的年级组长算嘛官？妻子说，那你就懂了，年级组长是“中层干部”，在学校算是个不大不小的领导呢！

这让我联想起当年在大学教书的情形。在我们大学，除了校长外，其他教师，无论是当了院长、系主任还是处长，只要本人原来的身份是教师，大家都仍然叫他“老师”，这样的称呼感觉非常温馨。如果一个教授当了学校的处长，你改口喊他“处长”，那一定会让人觉得你很俗。所谓“处长”“主任”之类称呼只给那些专职行政人员。

深圳的情况真与我原来的大学有天壤之别，“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老师，在这里竟然成了羞于启齿的称呼。在深圳的教育部门，除非你实在没有任何可以替代“老师”的头衔，一般人是不会喊你“老师”的。以我为例，我就是一个普通研究人员，无任何官职，但到中小学参加课题活动的时候，从来没人叫我“李老师”，而代之以“李教授”或“李博士”。我想，幸好我还有一两个可以替代“老师”称呼的头衔，否则真给别人出难题了。

称谓问题看似微不足道，实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城市的文化特质和

价值取向。生人之间称“老板”，是深圳“拜金文化”的直接体现；熟人之间呼官名，是深圳“崇官文化”的真实写照。总之，深圳的主流文化仍然是追求金钱与权力，而不是其他精神层次的、更有文化内涵的东西，有钱有权就是个人物，有钱有权才有资格受到尊重。“拜金文化”与“崇官文化”交织在一起，相互呼应，相得益彰，形成深圳城市品位提升的一大阻力。

我去过的地方不多，不了解其他城市的情况。我听说品位最高的地方是山东某县，据一位来自该县的朋友说，在他老家，见到陌生人喜欢叫“校长”。校长者，教师中的老大也！该县大概毗邻孔孟之乡，文化品位不凡！我知道品位最低的是中部某大城市，据说该市市民见面，一高兴就互相喊：“个××养的！”可见，深圳的文化品位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2006年11月）

“40位教授争一个处长”是谁的悲哀？

最近，关于某市“40个教授争一个处长职位”的新闻在网上被炒作得沸沸扬扬。平心而论，作为一位在大学任教近20年的教师，读到这类题目，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此类事情我见得太多了，我甚至都快忽略这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大学的悲哀、中国社会的悲哀！我完全赞同。不过，我认为40个教授竞争一个处长，不仅是中国大学中国社会的悲哀，更是中国教授自身的悲哀！此事足以反映当代某些大学教授境况之灰暗、心态之卑下、心理之迷茫、自信之匮乏！

按说，教授做官是“学而优则仕”，无可厚非。可如今某些教授去争抢处长副处长之位早已不能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来解读。众所周知，读书做官一直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追求。尽管那时的读书人做官目的纷繁复杂，但很多人还是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如孔夫子就是个“官迷”，可他做官是为了实现“克己复礼”的政治抱负。但如今某些教授做官早与“修齐治平”之理想毫不相关，他们之所以愿意放下

教鞭、逐鹿官场，甚至不惜低三下四、出卖人格尊严来为自己谋得一官半职，其主要目的或许自己最清楚。

当然，完全把教授做官归因于“境界不高”或“唯利是图”有些片面和简单化。仔细研究一下中国高校的现状就知道教授做官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无奈之举。多年来，中国高校严重的“官本位”，使大学教授在学校日益边缘化，地位和影响力江河日下，机关一个小小的科长科员就可以对教授指手画脚。同时，稀缺的学术资源已被为数极少学术“重镇”和学术“大佬”高度控盘，普通教师发展空间日益狭窄，学术自信心日渐衰微……在这种条件下，越来越多的教授只好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寄托于做官了。

最近读《岁月与性情——周国平心灵自传》时，有句话引起我的共鸣。他的原话我记不清了，大意是：那些把当院士、议员、部长做目标的人，在他看来都一样，他们身上散发的是同样气味，这种气味使他不能忍受和他们在一起呆上三分钟！我对周国平的作品历来好感不太多，总觉得有些故作深沉。可这句话让我对他的敬意倍增。我一介普通书生，不可能像周国平那样清高，更达不到“视金钱权力如粪土”的境界（我的朋友中官员也不少，他们都是大好人）。但谈及“40个教授竞争一个处长”的时候仍然有些心痛，再联想起这40位教授的形象：或儒雅、或冷傲、或慈祥、或憨厚，却一律隐藏着一颗躁动不安且深不可测的从政之心，更觉得有些可怕。做官名利双收，确实好，可有朝一日，大学教授们都一边教书、一边想着去做官，不是40个，而是400个、4000个教授争一个处长职位时，中国大学也就彻底没希望了。（2008年9月，《杂文报》登载）

为教授职称评审中的“教学标准”叫好！

在昨天的教授资格推荐评审会上，校长建议评委们要重视参评人员的教学水平，特别要参考教学测评的成绩。对此，我举双手赞同！此举若长期坚持，必将对学校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虽然在国家政策层面早就喊出“将教学置于学校中心地位”的口号，但真正落实者寥寥。即使学校领导重视教学，教师真正重视者似乎也寥寥。在理论界，学者们热衷于对大学职能不断拓展的鼓吹，从“三职能”“四职能”到“七职能”“八职能”应有尽有，令人眼花缭乱，可大家似乎遗忘了大学本来的职能，那就是人才培养；大学最基本的性质就是学校，而不是一个科研机构、更不是一个服务公司；教师就是教师，而不是老板、政客。前天，我在给本所研究生上课的时候，建议他们：当众人都在宣扬现代大学职能多样化、多元化的时候，你们要反过来倡导现代大学要回归本源——回到重视培养人才的正道上来！

教学备受冷落的原因很复杂，其中在职称评审中“重科研、轻教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查各地各校教授资格评审文件，确有教学标准，但不过都是“教学效果好”之类的软标准，就算上了多少节课这样的标准也无助于考察教师的教学效果和质量。我校把教学测评成绩与科研成果一起作为教授评审的参考。这样，某些科研成果不少，但教学效果不好，多次考评成绩靠后者，很可能就会落选，这无疑是对长期以来教授评审中“唯科研论”“唯论文论”的颠覆。虽然目前教学测评的标准和方式，还有很多值得完善之处，但我想如果一个教师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七次八次的测评都在后30%，这肯定是自己教学有问题了。这其中有个别教师可能是教学态度相当好，但教学能力欠缺，这样的教师当上教授似乎也说得过去，但某些教师上课不负责，忽悠学生，敷衍了事，历届学生皆恶评如潮，如果这样的人还能顺利地晋升副教授、教授，那是我们大学的悲哀。

我想，把教学测评成绩作为职称评审的重要依据，并成为一种制度，必然会促使每个教师都重视每一堂课的教学，不敢有丝毫马虎和松懈，并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对于已经评上教授、副教授的教师，在续聘时也不妨看看教学测评成绩表。某些长期不受学生欢迎的教授、副教授，是否还有继续聘任的必要，就很值得考虑了。

总之，坚持职称评聘中的“教学标准”，是对大学内在逻辑的尊重，是对学生的尊重，也是对“教师”这个称号的尊重。这个做法或许会让个别教师感到委屈，但对大学的发展，特别是对大学教学质量的提高肯定有积极的意义。（2010年9月，《深大通讯》登载）